



Akutagawa Ryunosuke's Meetings with Chinese Politician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s View of China

ZHAO Chenxi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uly 19, 2025

Accepted: August 17,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O Chenxi. (2025). Akutagawa Ryunosuke's Meetings with Chinese Politician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s View of Chin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244–252, DOI: 10. 53789/j. 1653–0465. 2025. 0504. 029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29>

Abstract: Akutagawa Ryunosuke's 1921 trip to China resulted in his only full-length non-fiction work, *Travels in China*. Due to its realistic nature, this work has become a key text for interpreting his view of China. Existing research often focuses on the surface-level satirical narrative and moral criticism within the work, or accuses it of a “colonial gaze” from an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Some scholars have also noted Akutagawa's meetings with Chinese political figures such as Zhang Binglin (Zhang Taiyan), but these discussions mostly remain at the level of describing the events or their artistic influence. This paper, taking *Travels in China* as its primary text, argues that Akutagawa's meetings with Zhang Binglin, Zheng Xiaoxu, Li Renjie (Li Hanjun), and others were not merely ordinary cultural exchanges. Instead, they served as the crucial catalyst for a fundamental shift in his view of China, propelling his perception from an aesthetic utopia toward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lex picture. This reevaluation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reassessing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is travelogue a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perspectives of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owards China.

Keywords: *Travels in China*; Akutagawa Ryunosuke; view of China; political meeting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AO Chenxi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Her email address is 2225365158@qq.com.

芥川龍之介與中國政治家的會面及其中國觀重塑

趙晨茜

成都理工大學

摘要:芥川龍之介 1921 年的中國之行催生了其唯一的紀實長篇《中國遊記》，該作因其寫實性成為解讀其中國觀的關鍵文本。現有研究多聚焦於作品表層的諷刺敘事與道德批判，或從東方主義視角指責其『殖民者凝視』，亦有學者關注芥川與章炳麟等中國政治人物的會面，但多停留於事件表面或藝術影響。本文以《中國遊記》為研究對象，主張芥川與章炳麟、鄭孝胥、李人傑等人的會面並非普通文化交流，而是促使其中國觀發生根本轉變的核心因素，推動其認知從審美烏托邦轉向多維複雜圖景，對重新評價該遊記的文學價值及理解日本近代知識分子的中國心態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國遊記》；芥川龍之介；中國觀；政治會面

一、引言

芥川龍之介 1921 年的中國之行，催生了其創作生涯中極具特殊性的文本——《中國遊記》。這部作品作為芥川唯一的長篇紀實著作而占據獨特地位，因其遊記的特殊題材較為寫實地記錄了芥川對中國的真實想法和心態，成為了解讀芥川中國觀的密鑰。

現階段對芥川中國觀的解讀多聚焦於《中國遊記》文本表層的諷刺敘事，其評價可謂不盡如人意。如巴金（1986）認為芥川在《中國遊記》中過於批判中國；武田泰淳（1950）也認為芥川在書本中所言完全為自己的一己之私，未能完全考慮中國人民的苦惱。部分學者也從東方主義的視角進行批判，如朱樹文（2021）指摘《中國遊記》的『殖民者凝視』。關於芥川與中國幾位政治家的會面，邱雅芬（1999）指出，章炳麟對芥川龍之介晚期創作的影響是極深遠的。川尻文彥（2023）提到，對於芥川而言，那些『比藝術低劣好幾個檔次』的政治議論，根本引不起他的興趣。上述研究或停留於文本表象的道德評判，或單純觸及會面事件，未能穿透遊記的紀實外殼，捕捉其引發的芥川對中國認知的轉換。

本研究以《中國遊記》為研究對象，以芥川龍之介與中國政治家的會面與其中國觀重塑為核心命題，提出芥川與中國政治家章炳麟、鄭孝胥、李人傑的會面，絕非普通的文化接觸，而是促使其中國觀轉變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旨在論證芥川與中國政治家的會面深刻影響了其中國觀，完成了從審美烏托邦到多維認知的重塑。這一過程不僅呈現出近代日本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複雜心態，對於重新評價《中國遊記》的文學意義也具有重要價值。

二、文學烏托邦的幻景

芥川龍之介的中國認知，在 1921 年踏足上海前，本質上是一座由古典文本砌築的文學烏托邦。漢籍滋養的審美想象，將中國凝練為唐詩的明月與水滸的俠義——一個剝離歷史痛感與政治實體的美學符號。這

種認知建構始終與藝術至上的信條共生；現實政治被刻意懸置於藝術聖殿之外，無論是本土的軍閥混戰抑或中國的時局激蕩，皆被視作對純粹審美體驗的粗鄙侵擾。在此認知圖式中，中國僅作為東方主義的精神原鄉存在，其多維度的苦難、掙紮與變革訴求，均被隔絕於烏托邦的圍牆之外。

（一）古典文本的滋養與對中國的想象

芥川養父家族瀰漫著濃厚的文化氛圍，置身於此環境中的芥川龍之介深受熏陶。他自幼便開始閱讀《西遊記》《水滸傳》等漢籍，與中國古典文化結下不解之緣。此後，未曾踏足中國的芥川憑借對中國幻想的寄托，創作出一系列以中國為背景的『中國物』小說，例如《杜子春》《秋山圖》等作品。中國古典文本的滋養使其將中國視為東方美學的終極符號——一個承載著李白詩酒、三國韜略、宋元畫境的文化原鄉。

在到訪中國以前，芥川龍之介的『文本中國』本質上是一個由漢籍經典權威認證的封閉美學系統。在其認知圖景中，現實中國的好壞完全取決於其與文學傳統的契合度。當他在上海弄堂盡頭望見湖心亭時，寫到『傳說中每有見聞』（上海遊記六城內上），這表明芥川看到的景觀價值源於文獻記載而並非眼前的實體存在；而上海城隍廟神像因『與《聊齋誌異》《新齊諧》插圖一般無二』獲得『敬服』（上海遊記七城內中），更印證現實中國需經古典文本認證方能獲得芥川的認可。這種認知機製在江南觀察中愈發明晰：車窗外水鄉被解構為『南畫式船』『粉壁』『拱形石橋』『嫩柳』的符號組合（江南遊記二車中）；西湖景觀必須剔除紅磚洋樓以逼近『南田畫境』，玉帶橋唯有覆滿『蒼苔青青』才稱得上是『《西湖佳話》中的嶽將軍之靈』（江南遊記七西湖）。歷史人物亦成了芥川評價的標桿——杭州夜宿時他執念於虛構『古風李太白凝望牡丹傾酒』的場景（江南遊記三杭州一夜）；靈隱寺也因『駱賓王傳說』而充滿『空氣中飄蕩詩人氣息』（江南遊記十二靈隱寺）。這些實例共同揭示芥川認知的本質：中國現實僅是漢籍經典的註釋本，其存在意義在於為文本中國的傳奇提供實體佐證，任何溢出傳統框架的現代性元素皆被視作對美學烏托邦的背叛，體現在文本中即是無盡的失望與批判。

（二）『藝術至上』下的政治疏離

吉岡由紀彥在《芥川龍之介和藝術至上主義》中對藝術至上解釋如下：『各家所使用的『藝術至上主義』概念雖紛繁多樣，但大致是指向前述作品中藝術家們一心精進以求藝術臻於完美的姿態。』高橋義孝在《現代藝術觀的成立》（新潮社出版）中表示『藝術被視為一個內在的存在，與生活及其他事物，也就是與外部一切現實絕緣，是一個完全與任何目的論無關的異質現實』。因此，芥川龍之介的『藝術至上』原則在其最開始的中國認知中就築起了一道自覺的政治疏離壁壘。中國被嚴格限定為文學與美學的場域，任何涉及時局變革、社會矛盾的議題皆被視為對純粹審美的褻瀆。

吉田精一（1942）所指斥的《中國遊記》『並非無趣之作，但終究只是小說家眼中的中國，未能如報紙或報紙讀者所期待那般，深刻洞察中國的現在與未來』恰是芥川踐行藝術至上主義的必然結果。神田由美子（1985）在《中國旅行》中提到：面對1921年中華民國的政治動蕩期，芥川刻意懸置對時局的考察；即便接觸章炳麟等政治家，亦僅止於表象觀察而拒絕深入政治內核。相反，他聚焦於『支那風俗』遺存與『支那美人』意象這類文化符號，本質上反映了文學想象對現實觀察的優先性。兩位學者的批評不謀而合，共同闡釋了藝術至上主義框架下芥川中國認知中政治維度的選擇性缺失。例如，書中屢見帶有蔑視中國色彩的表述，其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也被認為流於表面。很難說它發揮了諸如傳播中國最新動態、或是喚起『支那趣味』這類文化關注的作用。



三、與中國政治家的會面

當芥川龍之介懷揣著對烏托邦的想象踏入中國時，他與章炳麟、鄭孝胥、李人傑三位政治人物的會面，瓦解了其行前構建的文學化中國想象。

（一）章炳麟

1921年3月，芥川龍之介見到了他久聞大名的章炳麟。作為中國哲學家、國學大師、社會活動家，章炳麟與孫文、黃興並稱近代中國革命三大核心人物。中國文豪魯迅曾評價：『章氏於革命史上的功績，實遠超其學術成就』，這並不是指其學問不足稱道，而是強調其革命貢獻之顯著。芥川在《上海遊記》中記錄了此次會面：

在章炳麟氏的書齋裏，不知是出於何種趣味，有一條巨大的鱷魚標本匍匐在牆上。不過這個為書卷所埋沒的書齋正如成語所形容的：寒冷徹骨，讓人覺得鱷魚仿佛是個諷刺。（略）何況那間鋪著地磚的房間裏既無地毯，又無暖爐。而坐席當然也是不鋪坐墊、棱角分明的紫檀交椅，加之我身上穿的是件薄薄的嗶嘰夾衣。（略）然而章太炎先生卻身著深灰色大褂兒，外加一件厚毛皮裏子的黑色馬褂兒，自然不冷。何況先生的坐席是鋪著毛皮的藤椅。（略）『遺憾的是當今的中國政治墮落，不正之風公然橫行，比起清朝末期來，也許更為猖獗。（略）誠然，部分學生歡迎工農主義。可是學生並不等於就是國民。而即便是他們，哪怕赤化了，有朝一日也一定會拋卻其主張。這是因為國民性，熱愛中庸的國民性，遠要強於一時之感激的緣故。』章炳麟氏片刻不停地搖晃著留著長指甲的手，滔滔不絕地闡述著獨家學說。而我——只覺得冷。（略）我一面側耳傾聽，一面不時地眺望著牆上的鱷魚，並且胡思亂想著與中國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條鱷魚，無疑熟知睡蓮的氣息、太陽的光線與溫暖的水。如此看來，現在我的寒冷，肯定與那鱷魚最能相通。鱷魚喲，被剝製成標本之前，你是幸福的。憐憫我吧，憐憫這依然活著的我。

原文反復提及鱷魚一詞，值得分析。鱷魚原是熱帶屬性的動物，原本是『熟知睡蓮的氣息、太陽的光線與溫暖的水』的生物，卻待在『寒冷徹骨、既無地毯，又無暖爐』的書房裏，這種矛盾不禁讓芥川感到諷刺。除此之外，章太炎先生『毛皮馬褂坐鋪皮藤椅』，而芥川卻『薄嗶嘰夾衣坐紫檀冷椅』，這直接體現了主客觀處境的差異。芥川『只覺得冷』，既源於真實體感，亦因章氏『當今中國政治比清朝更墮落』等言論引發了芥川作為當場日本人的不安。環境的對比實為批判者與被批判者處境的客觀映照。『被剝製前幸福』的感嘆實為芥川對政治的逃避隱喻——以物喻己，表達寧無知覺亦不願承壓的逃避心態。此會面的直接影響體現於芥川的即時心理震蕩：章氏以『政治社會問題』為單一議題的雄辯，迫使芥川在窘迫中直面中國現實。在《中國遊記》的文本中，芥川並未直接表明其對章炳麟的看法，只留下看似無所指的『鱷魚』『寒冷』等表述。

（二）鄭孝胥

鄭孝胥，字太夷，又字蘇戡，是活躍於甲午戰爭時期的清朝官僚政治家。他生於1860年，曾作為外交官赴日，在甲午戰爭期間回國，後來在上海發起了立憲運動。在芥川龍之介訪問中國的1921年前後，鄭孝胥因深惡共和製，正在上海隱居。芥川去世後的1932年，他被推舉為滿洲國的國務總理。他原本是儒學者，擅長詩歌與書法。對書法頗有興趣的芥川，在赴中國之前就已見過鄭孝胥的書法作品。在致佐佐木茂索的信中



他曾寫道『鄭先生早已其書法知名，因而相見倍覺親切』（1921年4月26日致佐佐木茂索函）。在《上海遊記》中詳細記述了與鄭孝胥先生的會面：

（略）五分鐘後，我們被領入客廳。這裏除卻牆上掛著的書畫，幾乎別無陳設。不過壁爐臺上，左右一對瓷花瓶裏，小小的黃龍旗兒垂著尾巴。鄭蘇戡先生不是中華民國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國的遺臣。我望著這小旗，忽然想起了依稀記得的某人品評鄭氏的一句話：『他人之退而不隱者，殆不可同日論』。（略）身材高大的鄭孝胥氏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是稍後不久的事。（略）不愧是當年的才子，處處顯得風采不凡。（略）想當年以康有為為中心，宛然如戲劇一般的戊戌變法之際，執演輝煌角色之時，更是何等地才情煥發，自是不難想象的。（略）倘以為是虛言，不論是誰只管去中國一睹即可。肯定不出一月，便會莫名地想談論起政治來。這無疑是當代中國的空氣中孕育著二十年來之政治問題的緣故。而不敏如我，竟而至於在遊歷江南一帶期間，這股狂熱始終未能降溫。……然而即便實行王政，倘要突破眼前的難關，也唯有等待英雄出現而已。而這位英雄身處當代，也只得面對利害錯綜的國際關係。由此看來等待英雄的出現，不等待奇跡的出現。（略）

芥川在文本中引用『他人之退而不隱者，殆不可同日論』這一評語，精準地揭示了鄭孝胥當時『隱居』上海的實質——其表面退隱卻從未真正脫離政治。而鄭氏於1932年出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依附日本扶植政權，這樣的政治選擇也與這句評價相互印證。鄭孝胥在對話中提出的『等待英雄』論，將解決中國困境的希望寄托於虛幻的『王政英雄』，也暴露了傳統士大夫在時代巨變中的困境。同時，芥川這種在特定時空下的政治討論狂熱，理應歸因於『當代中國空氣中孕育著二十年來之政治問題』的彌漫性影響以及與鄭氏的會見。『無人強迫，卻整日思考起與藝術相比遠為下等的政治來』，這一自白深刻揭示了其『藝術至上』立場在當時中國語境中的暫時性瓦解。置身於鄭氏懸掛黃龍旗的書齋——一個充滿舊王朝政治象征的空間，並與這位前清重臣對話，構成了芥川被迫『走下藝術高臺』的直接衝擊。

（三）李人傑

李人傑（1890—1927），即李漢俊，是中國近代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一。芥川訪滬期間，李漢俊以『覺醒知識分子』姿態與之深入討論中國社會革命，深刻影響了芥川的中國觀。《上海遊記》中關於李漢俊的中國革命思考記錄如下：

李氏雲，現代中國應將如何？此問題之解決，不在共和亦不在復辟。此種政治革命於中國改造之無力，過去既已證明之矣。現在亦復將證明之。然吾人之當努力者，唯社會革命一途而已耳。此乃宣傳文化運動之『青年中國』之思想家盡皆呼號之主張也。（略）且覺醒之中國士人，於新知識並不冷淡。非也，乃饑渴於知識也。然可充此饑渴之書籍雜誌匱乏，如之奈何？予為君斷言：刻下之急務在著述。或如李氏言耶。現代之中國無民意。無民意則革命不生，況其成功乎？（略）予雲，予失望於中國之藝術，予目之所及，小說繪畫，不足以共而談之。然觀中國之現狀，期待斯土藝術之興隆，期待者毋寧似誤也。除宣傳手段以外，問君有無顧及藝術之余裕乎？李雲。幾近於無。

李漢俊在與芥川龍之介的對話中系統闡釋了其改造中國的革命理論，其核心觀點可概括為三個維度：對傳統政治革命的徹底否定、以社會革命為根本出路，以及意識形態鬥爭優先的戰略抉擇。他指出『共和』與『復辟』皆無力解決中國問題，因其本質仍屬舊式權力更迭，無法觸動深層社會結構，唯有通過社會革命實



現系統性變革才是根本出路,並強調這一主張已成為『青年中國』知識界的普遍共識。他斷言『刻下之急務在著述』,因為當下民意缺失導致革命缺乏土壤,故亟須思想傳播培育革命條件。當芥川質疑中國藝術價值時,李漢俊以『幾近無暇顧及藝術』的回應,徹底確立了社會革命對文化領域的絕對優先性。與李漢俊的會面迫使芥川正視中國深層結構變革的必然性,直接沖擊了芥川『藝術至上』的信仰根基。在面對當下的中國時,古典漢籍中烏托邦式的象牙塔實為虛妄。

此番在上海與三位文人政治家相遇,圍繞中國前途展開的諸般政論交鋒,推動了芥川中國觀的重塑,對龍之介歸國後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

四、後期作品中的政治審視

芥川於 1921 年 7 月從中國返回日本,在與數位政治家會晤的過程中,芥川龍之介的社會意識逐漸孕育成長,其中國觀也實現了重塑,這些均在其後期的作品中有所體現。

(一)《將軍》

歸國當年秋季創作,於次年一月刊於《改造》雜誌的小說《將軍》,就是以中國為舞臺,刻畫日本冷血將軍的暴虐行徑的小說。它的出版與芥川中國之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這次中國體驗不僅為其提供了素材,更深刻影響了芥川的創作立場,可以說中國之行是《將軍》誕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小說中,芥川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國東北為敘事舞臺,通過刻畫日軍 N 將軍於對弈間隙輕描淡寫下令屠殺中國平民的冷血場景,徹底撕毀了日本軍國主義『文明開化』的虛偽面具。《將軍》辛辣諷刺了侵華日軍『持槍盜賊』的本質,將批判矛頭直指當年日軍偶像乃木希典。可以說此作標誌著芥川中國觀的革命性轉折:昔日對中華文明的浪漫化想象,在此重塑為對現代性暴力的血淚控訴。更為深刻的是,芥川將中國民眾由被觀看的他者重構為暴力的直接承受者。這片土地不再是文人懷古的審美對象,而成為映照日本國家罪惡的鏡鑒。這種從文化浪漫主義向社會批判主義的蛻變,即是 1921 年中國之行中李漢俊『社會革命論』的思想回響。

(二)《桃太郎》

1924 年 4 月,在初次與章炳麟會面的 3 年之後,芥川在隨筆《僻見》之二(《女性改造》第三卷第四號 1924.4)中直言了對章炳麟的景仰之情。

我在上海法租界拜訪章炳麟先生時,曾在那間懸掛著鱷魚標本的書齋裏,與先生討論日中關係。那時先生所說的話,至今仍在我耳邊回響。——『我最厭惡的日本人,是那個征伐鬼島的桃太郎。對於喜愛桃太郎的日本國民,我也不得不抱有幾分反感。』先生真是位賢人。我曾多次聽到(外國人)嘲笑山縣公爵,贊賞葛飾北齋,痛罵澀澤子爵。然而,卻從未聽說過有哪個日本通能像我們章炳麟先生那樣,對從桃子裏生出來的桃太郎加以抨擊。不僅如此,先生的這一抨擊,遠比所有日本通的雄辯都更包含著真理。

桃太郎是日本家喻戶曉的民間英雄,傳統故事講述他從桃中誕生,長大後帶著糯米團子收服狗、猴、雉雞,征伐鬼島上的惡鬼,奪回財寶凱旋,象征著正義、勇敢與成功。然而,芥川龍之介在其短篇小說《桃太郎》中對此進行了顛覆性重寫。他將桃太郎的征伐描繪成一場針對和平鬼島原住民的赤裸裸的侵略。在芥川

筆下,桃太郎成了掠奪財富與土地的殖民者象征,其行為動機影射了日本近代的軍國主義擴張。小說通過幸存的鬼在暮色蒼茫中哀嘆失去的家園與和平往昔,深刻批判了所謂『英雄傳說』背後隱藏的暴力與殖民行徑,對日本國家政策進行了尖銳諷刺。芥川在這篇文章中直言對章炳麟的敬意,可見章氏此番批判直接源於章炳麟的思想啟蒙,根本性逆轉了芥川的桃太郎認知。如關口安義(1997)所言『此乃對帝國主義日本的漫畫式揭露。作為特派員目睹中國現狀,芥川親見日本人之暴虐;受章炳麟言論激發,遂形成此桃太郎形象』。《桃太郎》中芥川針對桃太郎及其象征的『日本性』進行了毫不吝嗇的批判。通篇瀰漫的厭惡情緒實則是芥川殖民批判意識的文學彰顯。

(三)《侏儒的言論》

1925年芥川發表《倭寇》(《侏儒的言論》《文藝春秋》1925.5):

倭寇充分證明了我們日本人完全有資格與列強為伍的能力。在盜賊行徑、殺戮、奸淫等方面,我們也絕不遜色於那些為尋找『黃金島』而來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等。

芥川龍之介在這段話中,運用極致的反語和辛辣諷刺。表面上看,他在『誇贊』倭寇即隱喻的日本人的能力——有能力與西方列強『為伍』,甚至在暴行上『不遜色』。但他所列舉的『能力』和『不遜色』的內容,恰恰是最野蠻、最殘暴、最令人不齒的罪行:盜賊行徑、殺戮、奸淫。將這種暴行等同於『能力』並與列強並列,本身就是對殖民掠奪的殘暴性揭露,更是對日本民族性中這種野蠻、掠奪性成分的極致諷刺。字裏行間充滿了對民族劣根性的痛切認知、對軍國主義道路的憂慮以及一種深沉的悲憤與絕望感。

同年七月芥川還發表了《中國》二章(《侏儒的言論》《文藝春秋》1925.7):

螢火蟲的幼蟲在吃蝸牛時,並不完全殺死蝸牛。只是為了吃到新鮮的肉,而將其麻痹而已。以我日本帝國為首,列強對支那的態度,歸根結底,與這螢火蟲對蝸牛的態度別無二致。今日支那最大的悲劇,在於沒有一位能為無數國家的羅曼主義者——即『少年支那』——提供鋼鐵般訓練的墨索裏尼。

芥川在文中毫不留情地將螢火蟲幼蟲麻痹蝸牛以持續吸食其新鮮血肉比作日本對中國的政策。同時他看到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本質——並非徹底滅亡,而是通過政治、經濟、軍事等手段使其喪失真正的獨立和活力,從而能長期、持續地攫取利益。這表達了他對日本政府殖民擴張政策的強烈不滿和對列強行徑的深刻批判。此外,他看到了當時中國面臨的軍閥割據、列強環伺、社會動蕩的巨大困境,認為其缺乏有效的領導核心和組織力量來整合民族主義熱情,實現真正的變革和強大。他惋惜於中國雖有覺醒的青年力量,卻無人能將其有效地凝聚和鍛造成一股足以改變國家命運的力量,透露出他對中國現狀未能達到其理想狀態的失望。

1921年芥川初到上海時,對中國的認知還停留在書本中的理想的烏托邦。彼時他對章炳麟那洞穿時弊、直指『中國政治墮於清』的雄辯,尚感『只覺得冷』。只能以『鱷魚』的荒誕意象隱晦折射其對中國現實模糊而欲逃避的初識。至1924年,芥川在《僻見》中直抒胸臆,受章氏桃太郎之言論醍醐灌頂,創作出反殖民主題的《桃太郎》。這標誌著他經過深入思考,在章炳麟、鄭孝胥、李人傑等思想的深刻啟蒙下,形成了對日中關係及日本民族性批判性的新認知。至1925年,芥川在《倭寇》與《中國》二章中,以辛辣反諷將日本暴行與西方殖民者並列,並揭露日本對華政策如同螢火蟲麻痹蝸牛般持續掠奪的本質。至此他徹底擺脫了模糊與逃避,敢於直面並尖銳批判真正的中國、真正的日本及真正的世界,完成了其中國認知的深刻蛻變。



五、幻象的崩解與多重維度的生成

芥川龍之介的中國認知譜系,本質上是從古典理想主義遭遇現代性暴力的解構史。赴華前其精神版圖中的中國,固然非全然脫離時政的真空存在,但構成認知基石的始終是由典籍熔鑄成的烏托邦。芥川來華前並非完全不關心時事政治,但他對中國的認知核心是高度審美化、文學化、古典化的。他心中的中國是唐詩宋詞、水墨山水、《水滸》《三國》的世界,是一個供其精神寄托的文化烏托邦。政治現實在其認知框架中是模糊的、次要的,甚至是被古典光輝遮蔽的。因此,芥川赴華前的中國認知可以概括為是『基於古典文本的、脫離當下現實的、以審美為主導的中國想象』。

當芥川踏上中國的土地,與章炳麟、鄭孝胥、李人傑等各色知識分子的會面,強行刺破了烏托邦的濾鏡,成為了對其中國觀造成衝擊的核心。他們不再是書本裏的符號,而是活生生的、充滿矛盾、掙紮於時代洪流中的人。這些『見聞』粗暴地將中國的政治混亂、社會苦難等直接呈現在芥川面前。這些是他之前通過書本無法感知,也未曾真正納入其中國觀的殘酷現實。與這些知識分子的會面徹底動搖了其基於古典文本構建的理想化中國想象,並迫使其在震驚與困惑中,將政治動蕩、社會現實、知識分子的困境等殘酷而複雜的維度,強行納入其對中國認知的版圖,從而完成了其中國觀從『單一審美維度』向『多維現實認知』的深刻重塑。數月的親歷觀察中,軍閥混戰與社會動蕩也成為加劇其認知轉型的催化劑。正如 1921 年 6 月書信所證:他因『宜昌劫掠事件』被迫取消行程;擬赴漢陽時遭遇武昌暴動;計劃考察大同石窟卻因鐵路罷工滯留北京。這些碎片化的動蕩體驗,迫使芥川直面古典文本之外的現實。而歷史進程的殘酷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認知轉型:1923 年關東大地震後,中國各界傾力捐助逾 500 萬銀元,規模居各國之首,日本軍部卻恩將仇報,借『朝鮮人投毒』謠言屠殺 716 名華僑。當日本持續以經濟殖民掠奪中國時,芥川在湖南親歷的反日浪潮已演變為全國性抗爭,中日關係急劇惡化。這種時代因素構成了芥川思想轉變的宏觀條件。外部形勢的持續惡化,為幾位政治家的論述提供了註腳,使芥川得以真正理解中國民眾的生存現狀。當他在各地親歷的現實與章炳麟等人揭示的社會矛盾形成雙重印證。最終讓芥川意識到:中國民眾的困頓並非源於所謂『民族劣根性』,而是殖民侵略與內部權力傾軋共同造就的苦難。

顯然,這種沖擊對芥川中國觀轉變的結果不是簡單地『轉向關心政治』,而是其原有的、相對單純的審美認知框架被徹底撕裂。他被迫承認並努力理解一個極其複雜、充滿矛盾、甚至醜陋痛苦的現代中國。這個中國與其鐘愛的古典中國並行不悖,卻又形成尖銳對立。他從單純的風景名勝、古跡傳說,轉向對軍閥、官僚、革命者、普通民眾生存狀態的觀察。進而開始試圖理解中國問題的根源,從憧憬、好奇,轉變為震驚、失望、困惑、憐憫,甚至夾雜著對變革艱難的理解。此時芥川對中國的感情已經無法再以單一的『熱愛』或『厭惡』來概括。這種重塑後的複雜認知,促使他後期的創作開始觸及政治社會等主題,雖然一開始文學表達可能較為隱晦,但這正是其認知維度拓展後在文學上的投射。

參考文獻

- ① 巴金:《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 年版。
- ② 川尻文彦:《李漢俊について—中國共產黨創建の思想的背景と『星期評論』による—》,《愛知鼎立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研究科論》,2023 年第 3 期,頁 198-220。
- ③ 高慧琴,魏大海(譯):《芥川龍之介全集第五卷》,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 2005 年版。
- ④ 高橋義孝:《近代藝術觀の成立》,《新潮社》,1965 年第 11 期,頁 88-96。
- ⑤ 関口安義:《特派員:芥川龍之介—中國ではなにを視たのか—》,毎日新聞社 1997 年版。



- ⑥ 何荷,楊偉:《論芥川龍之介對近代蘇州的傳統性身份建構》,《外國語文》,2021年第37期,頁40-48。
- ⑦ 吉岡由紀彥:《芥川龍之介と藝術至上主義:藝術的価値をめぐって》,《立命館大學日本文學會》,2022年第5期,頁32-44。
- ⑧ 劉思麟,尹一:《近代日本の文學者と中國の知識人—芥川龍之介と辜鴻銘の日中交流の論考》,《國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25年第26期,頁247-260。
- ⑨ 陸曉光:《日本現代文學偶像的反戰先聲——讀芥川龍之介小說〈將軍〉》,《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頁85-88。
- ⑩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 ⑪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版。
- ⑫ 邱雅芬:《章炳麟對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創作之影響》,《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1999年第1期,頁69-73。
- ⑬ 施小輝:《中國遊記》,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 ⑭ 許丹青:《1920年代の『改造』における対『中國』言説》,《岡山大學大學院社會文化科學研究科紀要》,2018年第3期,頁197-208。
- ⑮ 武田泰淳:《中國の小説と日本の小説》,東京:巖波書店1950年版。
- ⑯ 朱樹文:《從〈中國遊記〉看芥川龍之介與東方主義》,《文學教育(上)》,2021年第9期,頁64-65。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